

四十年后看“十年”——鲁礼安的文革史

高伏林

面前穿着一身黑白相格外套的鲁礼安，不仅一头乌发，红光满面，而且走路大步流星，开言慷慨激昂，在街上若碰见，要说他三十出头也有人信，但实际上比他年轻许多，而且，他还蹲了11年半大狱，绝大多数人都被单独监禁。

他的一位老友告诉我，前几个月女作家方闻见到鲁礼安第一句话，竟也是一模一样的大意外：“你这么年轻！”

方闻写了一篇文章《一个人的文革史》，就是眼前鲁礼安的“文革”回忆专写的序。他将这本5 0 00字字的沉甸甸的书递给我——《仰天长啸：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忆天录》。

“请给我以火”

书名《仰天长啸》，出自白凤的《湘江红》。鲁礼安回忆说，母亲教的歌中自己最喜爱听高歌的就是这首《湘江红》：“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”那份壮士情怀，让少年鲁礼安热血沸腾，憧憬着长大后也要为国赴蹈蹈火，建功立业。

春秋以来，多少次他重新咀嚼这四个字，这一首词：“三十功名尘与土”在哪里？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在哪里？难道真只能落得“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”？

鲁礼安在入狱第八年的深夜梦醒，跪在铁窗内发下誓言：今生今世，只要能活着走出这口活棺材，就要说出这被大冤案的真相。虽然漫长的狱中岁月熄灭了把自己改造成为国家栋梁的梦想，“但活埋在地底多年，经受了巨大苦难的煎熬与磨炼，我可以成为一块煤、一块能燃烧的煤，用煤的火焰去照亮那一段暗无天日的历史，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遭受过怎样惨烈的苦难！”

“成为一块煤”——这话让他们已起文豪、郭沫若、叶文福那些自比为煤，渴望燃烧的诗。鲁礼安在第一篇中，引用的正是艾青的问诗名句：“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？……不，不，我还活着；请给我以火，请给我以火。”

发誓要说，是一回事，怎么说，则又是一回事。他在“文革”中有“武汉第一笔杆子”之誉，铺开了纸，却无法落笔。鲁礼安告诉许多维记者，过去的岁月一闭上眼就数万豪纷呈，但从哪里说起却茫茫无头绪。“最后我想到捷克作家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中的开头，这下一下子抽出了线头，千言万语如同开了闸般喷涌而出，一泻千里，写得畅快极了！”

“从门到窗子是七步，从窗子到门是七步”，捷克作家伏契克描写布拉格茨兹世大监狱狱卒牢房的这句话，我十岁时就从姐姐学的初中《文学》课本中读到过。

后来，命运安排我自己来阅读监狱这“大书”，在这本书里我又读到了这句话——我所在的囚室，从门到窗子，不多不少也恰好是七步。

七步，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，实在是太渺小、太微不足道了。“这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？”伏契克在他写的那本名叫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的书中问道：“在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，还要再经历几座牢房呢？”……

这间隔着木板地板七步来回的斗室，足够我思考各种问题，何况思想是不受空间限制的，思想可以冲破牢笼。……（摘自《仰天长啸》）

两种“文革”，三个阶段

鲁礼安在“文革”中是一个“造反派”。《仰天长啸》的上卷1 2卷，主要回忆两年“造反”的经历；下卷2 1卷，主要记叙1 1年为“造反”所受的惩罚和对“造反”的反省。

“文革”研究专家宋永毅在《造反派与三种人》一文中说过：对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“恐怕‘造反派’已经成了文革罪孽的两个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：上层是‘四大批’，下层则是‘造反派’。在某种程度上，造反派成了诬陷、阴谋和暴力的抽象代名词，承担着文革中所有罪恶的大半责任”。

人们习惯了说“十年浩劫”，其实，“十年”并非一以贯之，也不是“浩劫”两字就能一言以蔽之，而有多条线索复杂交织、回环起伏。不少学者、作家不断深化拓展“两个凡是”的涵义，即将毛泽东的“文革”和群众的“文革”分开来判断是非功过，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夺权的目的，与群众自身寻求，语言虽相同或相似，内涵并不一致——在高层，是夺领导权，在底层，是夺生存权。

有学者（例如姜弘）如此划分“文革”的阶段：

一开始近半年间是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，是有特权的“红五类”制造“红色恐怖”时期；中间不到两年，是多年来受压的弱势群体起来为不受迫害，争取权利的时期——这就是“造反派”时期。他们掀露天角星是在1 9 6 6年9月底毛泽东提出批判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之后，主要“业绩”不是“破四旧”“抄家”，而是“打倒走资派”，造富贵的反；1 9 6 8年后，“清理阶级队伍”、“一打三反”、“清查五一六”，是上层继续进行权力斗争并联手镇压“造反派”的时期。到1 9 6 9年初中共“九大”前后，“造反派”群体退出社会舞台。

“文革”中最令人听闻的游行血案，恰恰主要发生在前后两段，而非并中间“造反派”红火的一段。当然，“造反派”也并非清白无瑕，某些组织、某些个人参与迫害，对打人甚至打死人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。

不安分的基因被毛泽东激活

鲁礼安的故事正是“造反派”命运的缩影。这支“笔杆子”名不虚传，在七千字的第一篇中，就信手拈来古希腊大儒学派、布利丹笔下驴子、“能思想的苇草”、但丁、雪莱、曹植、泰戈尔的诗等十多个典故，与自己的记事事情浑然一体，充分展现他厚实的修养和敏捷的才思。但他就像一颗纵横即逝的彗星，光华炫目仅仅一年半。

鲁礼安出生于1 9 4 6年初冬。内战烽烟乍起，中国希望的曙光忽然暗淡，还在襁褓里的他，却却热了母亲自弹自唱为主耶稣的赞美：“平安夜，圣善夜，万福中，光华射……”父母给他姐姐取名，用了“平安夜”的“平”，给他则用了个“字”，寄托了这一对虔诚基督徒在天国地覆的年代，祈求上帝保佑小弟弟一生平安的心愿。

1 9 6 5年，鲁礼安从高中毕业，受影片《甲午风云》影响，考进华中工学院水下艇专业。上大学还不到一年，他和“百无禁忌”的无文化反革命、全心投入。伟大领袖亲自发动领导的革命，是“反修防修”、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”、“触及人的灵魂”的大革命，那是一场与百万青年一起义无反顾的无限、全心投入。

1 9 6 6年从夏天到秋天，伴随着一句句“造反有理”、“炮打司令部”的最高指示，这些年轻学生宛如坐上了过山车，忽一下直冲云霄，忽一下又飞跃深渊。工作组来了；工作组撤走了；“红卫兵”造反了；华工党委书记九思与各系领导都被“揪”出来监督劳动、挨斗请罪；又一帮学生成立“造反派”组织，造红卫兵要保护的“走资派”的……

鲁礼安身上不安分的基因激活了，第一次是就上辩论台向取代校党委的工作组发了了一炮：运动大方向没找准，在普通群众中大抓坏人；工作组还要学生用三天学习毛主席“老三篇”，改造好环境再投入运动——三天改造好世界观，“那不是活见鬼吗？”这最后一句话，引起会场好一阵喧嚣。

真正让他一夜成名，是一张批判团省委书记张体学的大字报。工作组撤走了，对工作组组织的辩论会场，张体学来到各校巡回演讲：省委工作组犯了压制群众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，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两派斗争之气的突响。但是会场会，这种说法让誓不两立的对立群众皆大欢喜，但被工作组为“中间偏右”的鲁礼安，却从中看出违反中央关于“文革”决定《十六条》的气味：“十六条”说：“一个要害，就是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的集中营和‘两派’。”“怎么能出成左派”“该会战”呢？他连夜写出大字报《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露》，同领导好谁也也没商量共同署名，鲁礼安只只署了自己的名字，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。天亮时，这张大字报前围观学生三层外三层，都在谈论这个著名船系系一年级6 5 5 6班学生鲁礼安的“高度的路线无知症”，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？“老实说我会很乐意得知，这飘然不知知道自己‘叛党’的份量”。

随后他声援蹈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造省委反的一张大字报，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，扩展到社会上。

王任重当时为对付不安分学生的“敲打出笼”。“鲁礼安到了当‘领头鸟’的滋味：领到‘红卫兵’袖章被收回；被宣布三代家谱，大字报和传单中无中生有地诽谤鲁安在抗日战争时期“跟随汪精卫，投降日寇，当了汉奸”。于1 9 4 2年由父汪记国民党，其母成了“国民党”成员——一条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反华的声应虫”，与他父亲是“同样的货色，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”。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“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”，“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，推翻湖北省委，逼至中南局，直指党中央，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”。

鲁礼安的造反派母亲被抄了三次，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“红卫兵”干的，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、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、踩碎的镜框、打破的玻璃杯，一片狼藉，格不怒诸：次日他母亲穿的老棉衣也戴着红卫兵章来抄家。这些半女同学跑只对首饰感兴趣，抄走金项链一条、父母结婚戒指一枚；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“积极分子”也来抄“四旧”，将几面镜子的衣物搜一空……

红卫兵组织被“红五类”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，武汉地区学校的“少数派”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名称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，区别于被其蔑称为“三字兵”的“保皇派”。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的兴起，伴随着一系列“造反事件”：在各院校抢夺“黑材料”（工作组对学生“揪斗算账”和整理的秘材料，将学生划为左右的“黑名单”）、抢占学校广播站……而充满造反派情绪的鲁礼安，因出身不便，竟不得其门而入；这他要参加游行串联“长征队”，都是在他被镇压写下血书之后，才被开恩批准。

“敢死队”先锋到大岁头上动土

鲁礼安在“文革”初期的“造反”行动中是个小试牛刀。他成为“造反派”一翼的领导人物，或者说一种思潮的代表，还是在1 9 6 7年所谓“一月革命”风暴之后。当时“造反派”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，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中“兄弟阋于墙”，争功争名，不可开交。武汉地区工人总部（简称工总）等十来个组织，在《长江日报》上发表声明，攻击其后造反派组织是“托派”和“湖北省委第五派别”，引发了“造反派”内部一场空前大战。对“造反派”早已忍无可忍的武汉军区宣布出动“反革命组织”，勒令解散，抓走了分部以上头目近5 0 0人。

寒颤人心的车在江城夜空呼啸奔驰，揪发了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加入“造反派”组织、在《新华日报》当编辑的鲁礼安。他奋笔亲书一篇文章，借巴黎公社的启示，要求“正确地看待造反派的功过”。“不仅如此，”“我素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发作。太岁头上也敢动土”，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敢质疑。当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“二月指示”，肯定天津夜空中学“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”的做法。鲁礼安质疑说：延安学上报材料抄学生“仅用一天就实现了全校大联合”，可能吗？“短短一天能搞出成百上千人而导致的思想分歧、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视的情势？他断定这是假的，是有人地制了“抽掉两条路线斗争矛盾则分派”，“怎么能出成左派”“该会战”呢？他连夜写出大字报《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露》，同领导好谁也也没商量共同署名，鲁礼安只只署了自己的名字，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。天亮时，这张大字报前围观学生三层外三层，都在谈论这个著名船系系一年级6 5 5 6班学生鲁礼安的“高度的路线无知症”，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？“老实说我会很乐意得知，这飘然不知知道自己‘叛党’的份量”。

随后他声援蹈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造省委反的一张大字报，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，扩展到社会上。

王任重当时为对付不安分学生的“敲打出笼”。“鲁礼安到了当‘领头鸟’的滋味：领到‘红卫兵’袖章被收回；被宣布三代家谱，大字报和传单中无中生有地诽谤鲁安在抗日战争时期“跟随汪精卫，投降日寇，当了汉奸”。于1 9 4 2年由父汪记国民党，其母成了“国民党”成员——一条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反华的声应虫”，与他父亲是“同样的货色，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”。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“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”，“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，推翻湖北省委，逼至中南局，直指党中央，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”。

鲁礼安的造反派母亲被抄了三次，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“红卫兵”干的，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、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、踩碎的镜框、打破的玻璃杯，一片狼藉，格不怒诸：次日他母亲穿的老棉衣也戴着红卫兵章来抄家。这些半女同学跑只对首饰感兴趣，抄走金项链一条、父母结婚戒指一枚；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“积极分子”也来抄“四旧”，将几面镜子的衣物搜一空……

红卫兵组织被“红五类”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，武汉地区学校的“少数派”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名称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，区别于被其蔑称为“三字兵”的“保皇派”。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的兴起，伴随着一系列“造反事件”：在各院校抢夺“黑材料”（工作组对学生“揪斗算账”和整理的秘材料，将学生划为左右的“黑名单”）、抢占学校广播站……而充满造反派情绪的鲁礼安，因出身不便，竟不得其门而入；这他要参加游行串联“长征队”，都是在他被镇压写下血书之后，才被开恩批准。

“敢死队”先锋到大岁头上动土

鲁礼安在“文革”初期的“造反”行动中是个小试牛刀。他成为“造反派”一翼的领导人物，或者说一种思潮的代表，还是在1 9 6 7年所谓“一月革命”风暴之后。当时“造反派”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，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中“兄弟阋于墙”，争功争名，不可开交。武汉地区工人总部（简称工总）等十来个组织，在《长江日报》上发表声明，攻击其后造反派组织是“托派”和“湖北省委第五派别”，引发了“造反派”内部一场空前大战。对“造反派”早已忍无可忍的武汉军区宣布出动“反革命组织”，勒令解散，抓走了分部以上头目近5 0 0人。

寒颤人心的车在江城夜空呼啸奔驰，揪发了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加入“造反派”组织、在《新华日报》当编辑的鲁礼安。他奋笔亲书一篇文章，借巴黎公社的启示，要求“正确地看待造反派的功过”。“不仅如此，”“我素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发作。太岁头上也敢动土”，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敢质疑。当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“二月指示”，肯定天津夜空中学“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”的做法。鲁礼安质疑说：延安学上报材料抄学生“仅用一天就实现了全校大联合”，可能吗？“短短一天能搞出成百上千人而导致的思想分歧、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视的情势？他断定这是假的，是有人地制了“抽掉两条路线斗争矛盾则分派”，“怎么能出成左派”“该会战”呢？他连夜写出大字报《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露》，同领导好谁也也没商量共同署名，鲁礼安只只署了自己的名字，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。天亮时，这张大字报前围观学生三层外三层，都在谈论这个著名船系系一年级6 5 5 6班学生鲁礼安的“高度的路线无知症”，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？“老实说我会很乐意得知，这飘然不知知道自己‘叛党’的份量”。

随后他声援蹈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造省委反的一张大字报，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，扩展到社会上。

王任重当时为对付不安分学生的“敲打出笼”。“鲁礼安到了当‘领头鸟’的滋味：领到‘红卫兵’袖章被收回；被宣布三代家谱，大字报和传单中无中生有地诽谤鲁安在抗日战争时期“跟随汪精卫，投降日寇，当了汉奸”。于1 9 4 2年由父汪记国民党，其母成了“国民党”成员——一条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反华的声应虫”，与他父亲是“同样的货色，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”。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“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”，“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，推翻湖北省委，逼至中南局，直指党中央，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”。

鲁礼安的造反派母亲被抄了三次，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“红卫兵”干的，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、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、踩碎的镜框、打破的玻璃杯，一片狼藉，格不怒诸：次日他母亲穿的老棉衣也戴着红卫兵章来抄家。这些半女同学跑只对首饰感兴趣，抄走金项链一条、父母结婚戒指一枚；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“积极分子”也来抄“四旧”，将几面镜子的衣物搜一空……

红卫兵组织被“红五类”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，武汉地区学校的“少数派”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名称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，区别于被其蔑称为“三字兵”的“保皇派”。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的兴起，伴随着一系列“造反事件”：在各院校抢夺“黑材料”（工作组对学生“揪斗算账”和整理的秘材料，将学生划为左右的“黑名单”）、抢占学校广播站……而充满造反派情绪的鲁礼安，因出身不便，竟不得其门而入；这他要参加游行串联“长征队”，都是在他被镇压写下血书之后，才被开恩批准。

“敢死队”先锋到大岁头上动土

鲁礼安在“文革”初期的“造反”行动中是个小试牛刀。他成为“造反派”一翼的领导人物，或者说一种思潮的代表，还是在1 9 6 7年所谓“一月革命”风暴之后。当时“造反派”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，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中“兄弟阋于墙”，争功争名，不可开交。武汉地区工人总部（简称工总）等十来个组织，在《长江日报》上发表声明，攻击其后造反派组织是“托派”和“湖北省委第五派别”，引发了“造反派”内部一场空前大战。对“造反派”早已忍无可忍的武汉军区宣布出动“反革命组织”，勒令解散，抓走了分部以上头目近5 0 0人。

寒颤人心的车在江城夜空呼啸奔驰，揪发了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加入“造反派”组织、在《新华日报》当编辑的鲁礼安。他奋笔亲书一篇文章，借巴黎公社的启示，要求“正确地看待造反派的功过”。“不仅如此，”“我素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发作。太岁头上也敢动土”，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敢质疑。当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“二月指示”，肯定天津夜空中学“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”的做法。鲁礼安质疑说：延安学上报材料抄学生“仅用一天就实现了全校大联合”，可能吗？“短短一天能搞出成百上千人而导致的思想分歧、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视的情势？他断定这是假的，是有人地制了“抽掉两条路线斗争矛盾则分派”，“怎么能出成左派”“该会战”呢？他连夜写出大字报《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露》，同领导好谁也也没商量共同署名，鲁礼安只只署了自己的名字，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。天亮时，这张大字报前围观学生三层外三层，都在谈论这个著名船系系一年级6 5 5 6班学生鲁礼安的“高度的路线无知症”，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？“老实说我会很乐意得知，这飘然不知知道自己‘叛党’的份量”。

随后他声援蹈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造省委反的一张大字报，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，扩展到社会上。

王任重当时为对付不安分学生的“敲打出笼”。“鲁礼安到了当‘领头鸟’的滋味：领到‘红卫兵’袖章被收回；被宣布三代家谱，大字报和传单中无中生有地诽谤鲁安在抗日战争时期“跟随汪精卫，投降日寇，当了汉奸”。于1 9 4 2年由父汪记国民党，其母成了“国民党”成员——一条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反华的声应虫”，与他父亲是“同样的货色，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”。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“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”，“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，推翻湖北省委，逼至中南局，直指党中央，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”。

鲁礼安的造反派母亲被抄了三次，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“红卫兵”干的，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、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、踩碎的镜框、打破的玻璃杯，一片狼藉，格不怒诸：次日他母亲穿的老棉衣也戴着红卫兵章来抄家。这些半女同学跑只对首饰感兴趣，抄走金项链一条、父母结婚戒指一枚；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“积极分子”也来抄“四旧”，将几面镜子的衣物搜一空……

红卫兵组织被“红五类”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，武汉地区学校的“少数派”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名称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，区别于被其蔑称为“三字兵”的“保皇派”。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的兴起，伴随着一系列“造反事件”：在各院校抢夺“黑材料”（工作组对学生“揪斗算账”和整理的秘材料，将学生划为左右的“黑名单”）、抢占学校广播站……而充满造反派情绪的鲁礼安，因出身不便，竟不得其门而入；这他要参加游行串联“长征队”，都是在他被镇压写下血书之后，才被开恩批准。

“敢死队”先锋到大岁头上动土

鲁礼安在“文革”初期的“造反”行动中是个小试牛刀。他成为“造反派”一翼的领导人物，或者说一种思潮的代表，还是在1 9 6 7年所谓“一月革命”风暴之后。当时“造反派”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，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中“兄弟阋于墙”，争功争名，不可开交。武汉地区工人总部（简称工总）等十来个组织，在《长江日报》上发表声明，攻击其后造反派组织是“托派”和“湖北省委第五派别”，引发了“造反派”内部一场空前大战。对“造反派”早已忍无可忍的武汉军区宣布出动“反革命组织”，勒令解散，抓走了分部以上头目近5 0 0人。

寒颤人心的车在江城夜空呼啸奔驰，揪发了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加入“造反派”组织、在《新华日报》当编辑的鲁礼安。他奋笔亲书一篇文章，借巴黎公社的启示，要求“正确地看待造反派的功过”。“不仅如此，”“我素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发作。太岁头上也敢动土”，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敢质疑。当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“二月指示”，肯定天津夜空中学“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”的做法。鲁礼安质疑说：延安学上报材料抄学生“仅用一天就实现了全校大联合”，可能吗？“短短一天能搞出成百上千人而导致的思想分歧、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视的情势？他断定这是假的，是有人地制了“抽掉两条路线斗争矛盾则分派”，“怎么能出成左派”“该会战”呢？他连夜写出大字报《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露》，同领导好谁也也没商量共同署名，鲁礼安只只署了自己的名字，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。天亮时，这张大字报前围观学生三层外三层，都在谈论这个著名船系系一年级6 5 5 6班学生鲁礼安的“高度的路线无知症”，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？“老实说我会很乐意得知，这飘然不知知道自己‘叛党’的份量”。

随后他声援蹈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造省委反的一张大字报，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，扩展到社会上。

王任重当时为对付不安分学生的“敲打出笼”。“鲁礼安到了当‘领头鸟’的滋味：领到‘红卫兵’袖章被收回；被宣布三代家谱，大字报和传单中无中生有地诽谤鲁安在抗日战争时期“跟随汪精卫，投降日寇，当了汉奸”。于1 9 4 2年由父汪记国民党，其母成了“国民党”成员——一条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反华的声应虫”，与他父亲是“同样的货色，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”。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“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”，“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，推翻湖北省委，逼至中南局，直指党中央，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”。

鲁礼安的造反派母亲被抄了三次，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“红卫兵”干的，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、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、踩碎的镜框、打破的玻璃杯，一片狼藉，格不怒诸：次日他母亲穿的老棉衣也戴着红卫兵章来抄家。这些半女同学跑只对首饰感兴趣，抄走金项链一条、父母结婚戒指一枚；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“积极分子”也来抄“四旧”，将几面镜子的衣物搜一空……

红卫兵组织被“红五类”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，武汉地区学校的“少数派”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名称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，区别于被其蔑称为“三字兵”的“保皇派”。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的兴起，伴随着一系列“造反事件”：在各院校抢夺“黑材料”（工作组对学生“揪斗算账”和整理的秘材料，将学生划为左右的“黑名单”）、抢占学校广播站……而充满造反派情绪的鲁礼安，因出身不便，竟不得其门而入；这他要参加游行串联“长征队”，都是在他被镇压写下血书之后，才被开恩批准。

“敢死队”先锋到大岁头上动土

鲁礼安在“文革”初期的“造反”行动中是个小试牛刀。他成为“造反派”一翼的领导人物，或者说一种思潮的代表，还是在1 9 6 7年所谓“一月革命”风暴之后。当时“造反派”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，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中“兄弟阋于墙”，争功争名，不可开交。武汉地区工人总部（简称工总）等十来个组织，在《长江日报》上发表声明，攻击其后造反派组织是“托派”和“湖北省委第五派别”，引发了“造反派”内部一场空前大战。对“造反派”早已忍无可忍的武汉军区宣布出动“反革命组织”，勒令解散，抓走了分部以上头目近5 0 0人。

寒颤人心的车在江城夜空呼啸奔驰，揪发了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加入“造反派”组织、在《新华日报》当编辑的鲁礼安。他奋笔亲书一篇文章，借巴黎公社的启示，要求“正确地看待造反派的功过”。“不仅如此，”“我素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发作。太岁头上也敢动土”，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敢质疑。当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“二月指示”，肯定天津夜空中学“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”的做法。鲁礼安质疑说：延安学上报材料抄学生“仅用一天就实现了全校大联合”，可能吗？“短短一天能搞出成百上千人而导致的思想分歧、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视的情势？他断定这是假的，是有人地制了“抽掉两条路线斗争矛盾则分派”，“怎么能出成左派”“该会战”呢？他连夜写出大字报《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露》，同领导好谁也也没商量共同署名，鲁礼安只只署了自己的名字，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。天亮时，这张大字报前围观学生三层外三层，都在谈论这个著名船系系一年级6 5 5 6班学生鲁礼安的“高度的路线无知症”，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？“老实说我会很乐意得知，这飘然不知知道自己‘叛党’的份量”。

随后他声援蹈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造省委反的一张大字报，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，扩展到社会上。

王任重当时为对付不安分学生的“敲打出笼”。“鲁礼安到了当‘领头鸟’的滋味：领到‘红卫兵’袖章被收回；被宣布三代家谱，大字报和传单中无中生有地诽谤鲁安在抗日战争时期“跟随汪精卫，投降日寇，当了汉奸”。于1 9 4 2年由父汪记国民党，其母成了“国民党”成员——一条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反华的声应虫”，与他父亲是“同样的货色，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”。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“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”，“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，推翻湖北省委，逼至中南局，直指党中央，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”。

鲁礼安的造反派母亲被抄了三次，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“红卫兵”干的，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、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、踩碎的镜框、打破的玻璃杯，一片狼藉，格不怒诸：次日他母亲穿的老棉衣也戴着红卫兵章来抄家。这些半女同学跑只对首饰感兴趣，抄走金项链一条、父母结婚戒指一枚；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“积极分子”也来抄“四旧”，将几面镜子的衣物搜一空……

红卫兵组织被“红五类”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，武汉地区学校的“少数派”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名称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，区别于被其蔑称为“三字兵”的“保皇派”。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的兴起，伴随着一系列“造反事件”：在各院校抢夺“黑材料”（工作组对学生“揪斗算账”和整理的秘材料，将学生划为左右的“黑名单”）、抢占学校广播站……而充满造反派情绪的鲁礼安，因出身不便，竟不得其门而入；这他要参加游行串联“长征队”，都是在他被镇压写下血书之后，才被开恩批准。

“敢死队”先锋到大岁头上动土

鲁礼安在“文革”初期的“造反”行动中是个小试牛刀。他成为“造反派”一翼的领导人物，或者说一种思潮的代表，还是在1 9 6 7年所谓“一月革命”风暴之后。当时“造反派”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，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中“兄弟阋于墙”，争功争名，不可开交。武汉地区工人总部（简称工总）等十来个组织，在《长江日报》上发表声明，攻击其后造反派组织是“托派”和“湖北省委第五派别”，引发了“造反派”内部一场空前大战。对“造反派”早已忍无可忍的武汉军区宣布出动“反革命组织”，勒令解散，抓走了分部以上头目近5 0 0人。

寒颤人心的车在江城夜空呼啸奔驰，揪发了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加入“造反派”组织、在《新华日报》当编辑的鲁礼安。他奋笔亲书一篇文章，借巴黎公社的启示，要求“正确地看待造反派的功过”。“不仅如此，”“我素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发作。太岁头上也敢动土”，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敢质疑。当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“二月指示”，肯定天津夜空中学“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”的做法。鲁礼安质疑说：延安学上报材料抄学生“仅用一天就实现了全校大联合”，可能吗？“短短一天能搞出成百上千人而导致的思想分歧、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视的情势？他断定这是假的，是有人地制了“抽掉两条路线斗争矛盾则分派”，“怎么能出成左派”“该会战”呢？他连夜写出大字报《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露》，同领导好谁也也没商量共同署名，鲁礼安只只署了自己的名字，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。天亮时，这张大字报前围观学生三层外三层，都在谈论这个著名船系系一年级6 5 5 6班学生鲁礼安的“高度的路线无知症”，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？“老实说我会很乐意得知，这飘然不知知道自己‘叛党’的份量”。

随后他声援蹈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造省委反的一张大字报，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，扩展到社会上。

王任重当时为对付不安分学生的“敲打出笼”。“鲁礼安到了当‘领头鸟’的滋味：领到‘红卫兵’袖章被收回；被宣布三代家谱，大字报和传单中无中生有地诽谤鲁安在抗日战争时期“跟随汪精卫，投降日寇，当了汉奸”。于1 9 4 2年由父汪记国民党，其母成了“国民党”成员——一条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反华的声应虫”，与他父亲是“同样的货色，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”。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“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”，“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，推翻湖北省委，逼至中南局，直指党中央，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”。

鲁礼安的造反派母亲被抄了三次，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“红卫兵”干的，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、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、踩碎的镜框、打破的玻璃杯，一片狼藉，格不怒诸：次日他母亲穿的老棉衣也戴着红卫兵章来抄家。这些半女同学跑只对首饰感兴趣，抄走金项链一条、父母结婚戒指一枚；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“积极分子”也来抄“四旧”，将几面镜子的衣物搜一空……

红卫兵组织被“红五类”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，武汉地区学校的“少数派”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名称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，区别于被其蔑称为“三字兵”的“保皇派”。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的兴起，伴随着一系列“造反事件”：在各院校抢夺“黑材料”（工作组对学生“揪斗算账”和整理的秘材料，将学生划为左右的“黑名单”）、抢占学校广播站……而充满造反派情绪的鲁礼安，因出身不便，竟不得其门而入；这他要参加游行串联“长征队”，都是在他被镇压写下血书之后，才被开恩批准。

“敢死队”先锋到大岁头上动土

鲁礼安在“文革”初期的“造反”行动中是个小试牛刀。他成为“造反派”一翼的领导人物，或者说一种思潮的代表，还是在1 9 6 7年所谓“一月革命”风暴之后。当时“造反派”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，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中“兄弟阋于墙”，争功争名，不可开交。武汉地区工人总部（简称工总）等十来个组织，在《长江日报》上发表声明，攻击其后造反派组织是“托派”和“湖北省委第五派别”，引发了“造反派”内部一场空前大战。对“造反派”早已忍无可忍的武汉军区宣布出动“反革命组织”，勒令解散，抓走了分部以上头目近5 0 0人。

寒颤人心的车在江城夜空呼啸奔驰，揪发了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加入“造反派”组织、在《新华日报》当编辑的鲁礼安。他奋笔亲书一篇文章，借巴黎公社的启示，要求“正确地看待造反派的功过”。“不仅如此，”“我素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再次发作。太岁头上也敢动土”，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敢质疑。当时中共中央转发了毛“二月指示”，肯定天津夜空中学“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”的做法。鲁礼安质疑说：延安学上报材料抄学生“仅用一天就实现了全校大联合”，可能吗？“短短一天能搞出成百上千人而导致的思想分歧、精神隔膜和相互仇视的情势？他断定这是假的，是有人地制了“抽掉两条路线斗争矛盾则分派”，“怎么能出成左派”“该会战”呢？他连夜写出大字报《省委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暴露》，同领导好谁也也没商量共同署名，鲁礼安只只署了自己的名字，拂晓前贴到学院最显眼位置。天亮时，这张大字报前围观学生三层外三层，都在谈论这个著名船系系一年级6 5 5 6班学生鲁礼安的“高度的路线无知症”，互相在打听谁是鲁礼安？“老实说我会很乐意得知，这飘然不知知道自己‘叛党’的份量”。

随后他声援蹈于孤立的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造省委反的一张大字报，更使他的名气越出校园，扩展到社会上。

王任重当时为对付不安分学生的“敲打出笼”。“鲁礼安到了当‘领头鸟’的滋味：领到‘红卫兵’袖章被收回；被宣布三代家谱，大字报和传单中无中生有地诽谤鲁安在抗日战争时期“跟随汪精卫，投降日寇，当了汉奸”。于1 9 4 2年由父汪记国民党，其母成了“国民党”成员——一条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反华的声应虫”，与他父亲是“同样的货色，同时加入汪记国民党”。鲁礼安本人自然也就是“汪伪汉奸的孝子贤孙”，“妄图在武汉一哄而起，推翻湖北省委，逼至中南局，直指党中央，达到复辟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目的”。

鲁礼安的造反派母亲被抄了三次，第一次是他所在的华中“红卫兵”干的，他回家见满地都是书籍、纸片和横七竖八的衣物、踩碎的镜框、打破的玻璃杯，一片狼藉，格不怒诸：次日他母亲穿的老棉衣也戴着红卫兵章来抄家。这些半女同学跑只对首饰感兴趣，抄走金项链一条、父母结婚戒指一枚；第三天他家所在的街道的“积极分子”也来抄“四旧”，将几面镜子的衣物搜一空……

红卫兵组织被“红五类”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后，武汉地区学校的“少数派”红卫兵组织逐渐形成共同名称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，区别于被其蔑称为“三字兵”的“保皇派”。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”的兴起，伴随着一系列“造反事件”：在各院校抢夺“黑材料”（工作组对学生“揪斗算账”和整理的秘材料，将学生划为左右的“黑名单”）、抢占学校广播站……而充满造反派情绪的鲁礼安，因出身不便，竟不得其门而入；这他要参加游行串联“长征队”，都是在他被镇压写下血书之后，才被开恩批准。

“敢死队”先锋到大岁头上动土